

R
索·恩
THORN BIRD

国家图书评论非虚构小说奖

乔治·华盛顿图书奖

入围三（莫理尔·约翰逊奖（巴美列捷福奖））

帝国往事三部曲

Liberty's Exiles

The Loss of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美〕马娅·亚桑诺夫 著

马睿 译

自由的

流亡者

美国帝国的
东山再起
与英帝国的
永失

a Jasanoff

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马娅·亚桑诺夫 / 著

马睿 / 译

The Loss of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永失美国
与
大英帝国的
东山再起

自由的

Liberty's Exiles

流亡者上

帝国往事三部曲 I

Maya Jasanoff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LIBERTY'S EXILES

Copyright ©2011, Maya Jasanoff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本书赞誉

这本书研究精深、书写流畅，带给读者很多启发……
亚桑诺夫为〔效忠派〕书写了一篇恰如其分的颂词。

——安德鲁·罗伯茨 (Andrew Roberts), 《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

精到的叙事……亚桑诺夫的惊人成就在于她能吸引读者，让他们带着同情的兴趣去关注革命失败者的艰辛历程。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充满灵气和趣味……〔亚桑诺夫〕用自己出色的史学天赋书写了数万名效忠派被迫从北美殖民地出走

的经历，那里已经变成了美国。……她的这部著作钩深索隐，长处之一就是她能够极为精准动人地再现某些效忠派难民的故事。

——戈登·S. 伍德 (Gordon S. Wood)，《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一部全面而诱人的综述。

——《新闻周刊》(Newsweek)

一部有趣、有意义且文笔优美的研究著作，任何人如果认为美国的建国历程可以毫不含糊地定义为自由和公正摆脱了暴政和压迫之枷锁，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

失败者鲜有机会撰写历史，但北美效忠派总算有了自己的历史学家马娅·亚桑诺夫。这本书不仅写了他们在独立战争期间辛酸乃至悲惨的命运，还写了效忠派大流散，6万多黑人和白人男女流散到加拿大、加勒比地区、非洲和印度的经历。从未有人讲述过这个故事，且听亚桑诺夫用她不同寻常的优雅风格娓娓道来。

——约瑟夫·J. 埃利斯 (Joseph J. Ellis)，《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作者

一部才华横溢的重要作品。

——《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

由胜利者撰写美国历史且历史中仅有胜利者出场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但这样一部与美国革命为敌并最终战败的效忠派的历史，还是让我们等了太久。马娅·亚桑诺夫不仅让他们摆脱了后人的傲慢俯视，更让他们鲜活立体地跃现于纸上。《自由的流亡者》对革命年代种种事件的阐释充满才华和启迪，在过去三十年出版的书籍中，鲜有匹敌。这不仅是一部堪比琳达·科利的《英国人》的一流学术著作，还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杰作，它实现了历史学家最难实现的抱负：让过往的经历重获新生。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衰以及给全球强权的启示》作者

《自由的流亡者》这本书无论眼界还是立意，所涉之广还是研究之深，求真精神还是诱人气派——甫一开始就颠覆了所有毫无异议的假设——直可媲美琳达·科利或年轻时的西蒙·沙玛。事实上，马娅·亚桑诺夫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勤奋的研究人员和优秀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天才。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最后的莫卧儿：王朝的陨落，德里 1857》作者

马娅·亚桑诺夫的《自由的流亡者》从全新的视角再现了效忠派的经历和美国革命的余波。除了“1776年精神”外，亚桑诺夫还再现了致力于重建无敌大英帝国的“1783年精神”，随后又对效忠派在该重建中所起的复杂作用进行了极富魅力的重新解读。她这本析毫剖厘的著述写得优美动人，以最幽微的笔触修正了我们所知的历史，也奠定了她跻身于新一代优秀历史学家的地位。

——肖恩·威兰茨 (Sean Wilentz), 《美国民主的兴起》作者

马娅·亚桑诺夫的“帝国往事三部曲”还包括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

谨以此书纪念

卡马拉·森（1914~2005）

伊迪丝·亚桑诺夫（1913~2007）

他们是移居海外的侨民

也是说故事的人

历史叙事的双重反转（代译序）

美国革命的影响无远弗届。它的发生和胜利不仅是十多年后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的先声，也成为 20 世纪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启迪和鼓舞。多少争取民族独立的仁人志士热泪盈眶地诵读《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了破坏的作用，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多少在旧大陆受到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革命斗士远渡重洋，去膜拜纽约港自由岛上“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像。教科书上往往更偏爱称为的“美国独立战争”（又称“美国革命”），仿佛“美国”

在战争发生时已是既存事实，像爱默生在《康科德颂》（*The Concord Hymn*）中吟咏的，“耕农们在这里揭竿而起，那一声枪响传遍了世界”。仿佛在“一声枪响”的那个时间点，独立战争的两方已然壁垒分明、严阵以待，揭竿而起的一方代表正义的、进步的、必将胜利的被压迫者，而另一方毫无疑问是邪恶的、反动的、注定失败的独裁者。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会在每年7月4日这一天倾听德沃夏克（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的《自新大陆》（*From The New World*），让两个多世纪前那场正义压倒邪恶、进步遏制保守、自由战胜压迫的革命及其胜利激起心头的一腔热血。

哈佛大学柯立芝历史学教授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一书中反转了这些关于美国革命的传统叙事。她指出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内战”，在革命发生的那一刻，交战双方，“爱国者”和“效忠派”，都是大英帝国的臣民。无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我们描述过怎样闪闪发光的自由理想，它首先是一场尸山血海的鏖战，对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意味着暴力肆虐、枪林弹雨、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亚桑诺夫在本书开头阐述了“谁是效忠派”这个问题，揭示了几个我们从未了解、关注或思考的事实。

普遍存在的观念认为，效忠派是一群“保守精英”：身份优越，家有良田，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与英

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言之，既然是独立和革命的对立面，他们就一定是有产者、压迫者、独裁者、暴君或者他们的代言人。亚桑诺夫教授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事实上，历史学家估计，美国殖民者中始终效忠国王的人数在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效忠思想广泛地存在于早期美国的整个社会、地理、种族和民族谱系中，跟他们那些爱国同胞相比，这些人的‘美国性’一点儿也不弱。保守派既包括刚来不久的移民，也包括五月花号登陆者的后代。他们可能是王室公职人员，也可能是面包师、木匠、裁缝和印刷商。他们中既有英国圣公会牧师，也有卫理公会和贵格会教徒，既有见多识广的波士顿人，也有卡罗来纳偏僻乡村的农民。最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效忠派都是白人”，还有黑人和印第安人。也就是说，“效忠派”并非一个先验的概念，不是一小撮人的先天和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是效忠派，而是一大群人因选择对国王效忠、对帝国尽责而成为效忠派。效忠派的构成复杂多样，他们作出效忠选择的逻辑也大不相同。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子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虽然不是专制政权的朋友，也支持帝国改革，却无法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出生在马萨诸塞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雅各布·贝利（Jacob Bailey）认为，他曾宣誓对国王，也就是对他的教会元首效忠，如果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既是叛国，也是渎圣。但很多

人持效忠立场并非出于家国大义，只是个人希望维持现有秩序，觉得最好还是跟着那个熟悉的魔鬼。他们认为面对大英帝国全副武装的军队，北美外省叛乱获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还有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广泛存在，即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殖民地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分子要更有前途。还有人，例如留下了回忆录的伊丽莎白·约翰斯顿（Elizabeth Johnston），以及革命发生时年仅5岁的凯瑟琳·斯金纳（Catherine Skinner），则根本没有选择，只是因为父辈是效忠派，她们就被革命的洪流裹挟，半生流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最是由于“逐利”考虑而采取效忠立场的人群，当属在殖民地（乃至美国独立后很久）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的黑人和北美印第安人。革命为十三殖民地的50万黑奴提供了一个动人机遇，英方提出，同意参战的奴隶即可获得自由。2万名奴隶把握住这一承诺，从而使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内战之前最大规模的北美奴隶解放运动。革命同样为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提供了一个难以推却的选择。经历了对土地如饥似渴的几代殖民者的入侵和蚕食，好几个印第安部族，特别是北方的莫霍克人和南方的克里克人，选择与大英帝国结盟。

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美国革命的历史也更多是限定在美国疆域之内的叙事，忽略了革命发生时根本不存在“美国”，独立后的年轻共和国亦前途未卜。亚桑诺夫教授的这部效忠派大流散的全球史，

则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那场革命的失败者，尤其是循着选择与失败者同一阵线，并在战败后选择继续跟随失败者的那些人的足迹，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历史中的胜与败、善与恶、进步与保守、自由与束缚。英国战败，与独立的美国签订《巴黎条约》后，每一位效忠派都要作出去留的选择。为捍卫帝国的荣誉，英国提出那些无家可归、面对爱国者持续暴力威胁的效忠派可以选择前往大英帝国的其他领地殖民，大英帝国将为这些殖民者提供免费通道、供给和可耕种的土地。于是大约 60000 名效忠派（包括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离开了美国，前往英国本土、加拿大、加勒比地区、西非乃至印度。

除了向效忠派承诺提供保护、供给和土地之外，在前往英国本土的效忠派，尤其是中上层阶级效忠派的游说下，英国议会在 1783 年 7 月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在北美刚刚结束的这场纷争中因为忠于国王陛下并依附于英国政府而导致权利、财产和职业受损的所有人士的损失和贡献”。这就是效忠派赔偿委员会。它将力求证实每一位索赔人对帝国的忠诚，查明其财产的价值，并就赔偿金额提出建议。效忠派赔偿委员会的索赔申请截止日期原定在 1784 年 3 月，后来又延长到了 1786 年。最终，英国政府总共支付给效忠派 3033091 英镑——相当于今天的 3 亿英镑；2291 位效忠派收到了对自己所丧失财

产的赔偿金，另有 588 人收到了政府补贴，算是弥补了他们的损失。虽然除了少数人，大多数普通人得到的赔偿金都微薄得令人失望，可以说单是亲自到英国本土向委员会呈交证据这一条，就排除了大量无力支付路费的穷人，黑人和女性索赔人更是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但在 1780 年代，公共福利跟现代福利制度几乎毫无可比性，这一救济项目毫无先例可循，不得不说赔偿效忠派的做法是捍卫大英帝国荣誉的一大壮举。亚桑诺夫写道：“效忠派的存在本是在提醒世人帝国的失败，多亏了效忠派赔偿委员会，它变成了骄傲的资本，变成了英国人慷慨丰厚的证明。”效忠派赔偿委员会成为现代国际援助组织工作的重要先例和先驱。

与此同时，看到黑人效忠派流落英国街头的苦难生活，1786 年初，伦敦著名慈善家乔纳斯·汉韦（Jonas Hanway）和几位朋友一起成立了“穷苦黑人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发起了帮助黑人效忠派及其饥饿同胞的筹资活动。这样的人道主义行动发生在当时废奴运动日益兴起的英国，对黑人效忠派难民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长期影响。后来他们看到，为黑人设立施粥厂和诊所只不过是权宜之策，既然白人效忠派可以去往大英帝国的其他领地，何不让这些黑人效忠派也去碰碰运气，还可以去个更为暖和的地方，比方说西非海岸，那个他们的祖先被掳走的地方？于是短短数月之后，一支舰队在格林威治启航，把穷

苦黑人送到塞拉利昂去做拓荒殖民者。其后在 1789 年 4 月，约克郡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提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议案。亚桑诺夫认为废奴主义的兴起和英国奴隶制的废除，与英国永失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革命不但使得 50 万奴隶离开了大英帝国，还移除了一个重大的利益集团，即美国奴隶主阶级。如此一来，废奴主义者们就能在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进行自觉的道德评判，英国在 1772 年的“萨默塞特案（Somerset Case）”之后即判定拥有奴隶为不可执行之非法行为，而在“自由照耀世界”的美国，奴隶制仍然得到宪法的保护，一直持续到 1860 年代中期。

通过英国政府对效忠派难民的保护和赔偿承诺，亚桑诺夫教授总结出大英帝国“1783 年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明确致力于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所谓“1783 年精神”，与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所高扬的致力于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1776 年精神”相对，而是致力于威权、自由和全球扩张的精神。亚桑诺夫认为，英国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却经受了美国共和制异见的考验，战后对效忠派各项事务的处理更使它拥有了一套现成的做法和政策，在不到十年后的法国大革命中，英国祭出了王权和稳定等级制度下的有限自由模式，与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相抗衡，并最终获得了优势。这一切有助于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